

印尼客家女性婚姻移民在桃園楊梅語碼 轉換的個案研究

蔡芬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江卓安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博士班學生

黃菊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本文以桃園楊梅地區客家家庭的婚姻移民作為個案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探討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灣語碼轉換運作情形。以標記理論分析移民對話結構，剖析語碼轉換之社會動機以及社會語用功能。研究發現印尼客家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端視對話人以及對話主題而定，在客語、華語以及印尼語之間轉換，原則上多為客語及華語的融合，趨向華語使用。此外，對話對象的世代、移民在自身原鄉與在臺灣的處境影響其在語碼轉換時的社會動機。更甚者，從個案研究觀察到移民語碼轉換有其社會語用功能，以避免對於自身不熟悉事務表達錯誤，或使人容易理解；前一人使用語碼連帶影響另一人；在閒聊八卦時，有所避諱，易轉換為低階語言。

關鍵字：客家、東南亞、婚姻移民、語碼轉換

* E-mail: tsaiff@googlemail.com

投稿日期：2023 年 9 月 18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6 月 17 日

一、前言

自 1990 年代開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臺灣社會大量增加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婚姻移民¹。從 1987 年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婚姻移民的人數已高達將近 57 萬人 5 千人，其中中國籍（含港澳）高達約 36 萬 9 千人，東南亞大約 19 萬 4 千人。婚姻移民的人數僅與目前為 58 萬 2 千左右的原住民人數相差僅有 7 千人，若加上子女，總人數達百萬，在臺灣人口結構中已佔有一定比例。以東南亞而言，越南為婚姻移民最大宗的來源國，人數約 11 萬，其次印尼約為 3 萬人。與臺灣男性通婚的印尼女性多是來自西加里曼丹的華人，而且多數為客家人（夏曉鵬 2002）。更因為始自 1990 年代臺灣增加對印尼的投資而加速跨國婚姻的出現，印尼婚姻移民人數增多，不僅多為客家人，而其夫婿多為臺灣客家，這個現象從北部擴及中南部的客家聚落（夏曉鵬 1995）。夏曉鵬（2000）從宏觀之政治經濟架構與資本國際化來理解該現象為何出現的原因，臺灣與東南亞（如越南）在地政策與制度影響到人口結構、就業與移動亦是值得注意的因素。此外，印尼長期以來的排華政策與氛圍亦是促使女性向外移動的原因之一。對於印尼客家女性來說，遠嫁臺灣亦是出於相同的文化考量，可謂「跨國未跨族群」（張翰璧 2007）。最重要的是，因為印尼長期排華歷史，特別是蘇哈托新秩序時期（1966-1998），臺

1 本文以「婚姻移民」指稱研究對象，而非以目前官方、社會與媒體通稱的「新住民」，原因在於「婚姻移民」如實反映出移民來臺原因與社會位置，而「新住民」仍帶有特定指稱對象意涵，一般認為是透過婚姻，來自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女性。再者，2007 年，在「國境管制暨新移民女性培力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rder Control and Empowerment of Immigrant Brides）中，參與的各國移民／工團體代表以及學者專家做出重要決議之一，即是在英文世界中以「marriage migrants」取代「foreign brides」指稱婚姻移民（夏曉鵬 2018）。有鑑於上述兩個原因，本文在行文中採「婚姻移民」指涉研究對象。

灣提供印尼客家女性一個周遭同樣為華人的安全之境（蔡芬芳 2017）。

臺印通婚雙方皆為客家人的「文化親近性」表現在語言、風俗習慣、信仰等。由於跨國通婚的發生與文化層面息息相關，因此人們在選擇婚配對象時，會依據規範、價值與偏好之文化以及語言作為主要決定要素（Kalmijn and van Tubergen, 2010: 462, Hwang et al. 1997）。臺印通婚雖與相近文化實踐極為相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來自印尼的女性婚姻移民在臺灣婚後生活的適應上毫無問題。因為生活適應涉及「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Arkoff 1972）。以語言為例，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雖與臺灣夫家或是夫家所在的客家庄在語言上皆使用客語，然而腔調與用詞仍有差別（蔡芬芳 2017：273）。再者，雖然臺灣與印尼皆有客家之名，但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婚姻移民之文化實踐卻包括多重來源——印尼客家、印尼華人以及印尼（蔡芬芳 2017：273）。這三個部分可說是其鑲嵌在生命經驗中的認同歸屬，移民本身即為客家人，有其生活方式，同時又是在印尼的人群分類中屬於華人，來到臺灣之後，因屬移民且在與臺灣本國人相對之下，印尼人的身分因此凸顯。此外，移民女性之文化實踐會受到不同社會類別的影響，例如信仰基督教的媳婦因為自己宗教信仰而可能違逆極度重視祭祖的婆婆之意而產生誤會或是衝突，因此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文化親近性的角度，亦即當我們以此觀點來看待臺印客家通婚時，文化的內涵所指為何。

此外，通婚之後，文化依舊在通婚雙方及其與姻親之關係中發生作用，因為通婚後的家庭成為通婚雙方文化互動與進行文化實作的場域。在跨國婚姻中傳統「上嫁」婚配概念中，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被期待著有傳統特質，尤如侍奉公婆、烹煮食物、料理三餐、祭祀祖先、教養孩

子，這些場域皆屬於上述文化實作。「上嫁」概念可說是東亞傳統跨國通婚中的特色之一（Wang and Hsiao 2009: 3），不僅意味著經濟地位的差距，更有性別意涵，因為其一般指涉原生國家經濟情況不佳的女性嫁給經濟表現較好國家的男性（Lu and Yang 2010: 15）。此外，由於在東亞社會，婚姻不從個人角度出發，而是與家庭著重的傳宗接代與繼承家業有關，因此男性會選擇傳統女性，以便照顧自己的父母，在居住形式上多與公婆同住（Wang and Hsiao 2009: 5-7）。再加上，在透過商業仲介形成的婚姻關係下²來到臺灣的女性移民，常會受到夫家或鄰里的質疑，將負面刻板印象加諸身上。

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雖因其文化實踐與臺灣夫家相近，尤其是語言拉近不少與婆家的距離。因此，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也引起一些關注，關注的焦點包括家庭影響（黃玉玲 2014）、客語使用場合（吳孟晔 2014）以及探究語言與認同之關係（鍾鎮城、黃湘玲 2011），然而卻鮮少從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切入其語言使用情形，有鑒於此，本文以居住桃園楊梅的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參與者，在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12 月，透過深度訪談，紀錄女性婚姻移民在面對不同對象與在不同的場域之中，其語言選擇與語言態度如何，不同語言之間如何轉換，將有助於我們從語碼轉換具體運作情形，理解婚姻移民在臺灣的語言使用以及他們與社會的互動。

本文為進行語碼轉換的相關調查，進入楊梅地區「臺印喜悅協會」及「富岡榮耀教會」觀察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情況，透過這兩個據點找

2 有些是透過其他社會網路媒介而成的跨國婚姻（Lu and Yang 2010: 15），然須注意的是，即便是商業仲介，也有重視「人」的成分，例如在張雅婷（2005）與劉聰穎（2010）的論文中，可以窺見客家跨國通婚的特色。

尋有意願進行受訪之婚姻移民。本文實際訪問人數為 10 人，雖然在訪談資料中未出現所有的受訪者，然這構成研究者了解與觀察婚姻移民語碼轉換的基礎。文中僅採取 3 位訪談對象的對話內容作為分析材料的原因如後：首先，雪是本文團隊進行第二次訪談之對象，已較為熟悉，並透過雪的社會網絡介紹了雪在臺灣認識的好友——麗。其次，本文希望對話的受訪對象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能在多種對話主題下的語碼轉換情形，因此選擇有朋友關係的雪、麗以及雪的丈夫道為主。再次，雪、麗二人分別從印尼山口洋以及坤甸嫁至桃園楊梅已二十餘年，道則是世居在地的家族成員，因此不論是婚姻移民之間的談話交流，受訪者對於在地的語言使用，或是家庭內的語言交流，在對話過程中能夠出現「軟話」、「硬話」，皆能增語碼轉換的多樣性。綜上所述，基本資料中僅以雪、麗、道三人為主。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將訪問者與受訪者皆視為研究參與者，因為訪問者與受訪者皆在談話過程中有所互動，互相影響，故在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中同時列出訪問者與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名字（化名）、性別、年齡、身份認同、使用客語之腔調、以及聽說客語的掌握程度。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名字	性別	年齡	身份認同	使用客語腔調	客語掌握程度
雪	女	55~60	客家	印尼山口洋硬話	聽說皆可
麗	女	55~60	客家	印尼坤甸軟話	聽說皆可
道	男	60~65	客家	楊梅海陸客語	聽說皆可
碩	男	20~25	客家	苗栗四縣客語	聽可、說尚可
孟	女	20~25	客家	新屋海陸客語	聽可、說尚可
卓	男	20~25	客家	桃園四縣客語 桃園海陸客語	聽說皆可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本文以訪談方式了解桃園楊梅印尼婚姻移民語碼轉換情形，訪問主題為日常生活以及婚姻移民自身生活。本次談話音檔的發音人之中，一共 6 人，名字化名分別是雪、麗、道、碩、孟、卓。因雪、麗、道 3 人知悉本文是針對臺灣客家婚姻移民時，相當樂意接受訪問，希望能為臺灣客家婚姻移民研究盡份心力，碩、孟、卓 3 人則為訪問者。

二、跨國通婚中之語言因素與客家地區 東南亞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

通婚涉及兩個部分，分別是文化層面與結構要素，但兩者可以同時對通婚決定產生影響。首先，前者意指與其他群體成員的互動與締結婚姻時所依據的規範、價值與偏好之文化；其次，後者則是影響人們選擇內婚或是外婚的結構條件，例如鄰近他群與我群在人口規模上的比例（Kalmijn and van Tubergen 2010）。語言可說是影響通婚的文化層面之因素（Kalmijn and van Tubergen 2010: 462, Hwang et al. 1997）。例如張雅婷（2005）從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跨國婚姻仲介研究告訴我們，同樣身為客家人的身份是促成臺印客家人彼此通婚的主要因素。然而，無法忽略的是，在臺灣客家男性眼中，印尼客家女性所具有「傳統女性」特質亦是通婚原因。³ 與越南籍以及中國籍配偶相較之下，個性乖順、勤勞持家的印尼客家女性成為當地男性的更佳選擇，再加上語言上與夫家溝通無礙，使得當地居民特別偏好與印尼客家女性通婚（張雅婷

3 最初因為村內有人率先與印尼客家女性結婚，該名女性勤奮、耐勞，讓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村內適婚年齡的男性開始依循此一模式，建立家庭。後來該村這第一對臺印夫妻開始扮演起婚姻仲介的角色，其基礎建立在親友的關係與信任，以及良好的仲介形象（張雅婷 2005）。

2005)。從張雅婷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與臺灣其他外籍配偶通婚不同之處在於臺印客家通婚具有由文化、語言、華人血統所構成的特質。⁴ 臺印在婚配對象的選擇上將客家文化要素（客語）考量在內，這可謂臺印客家通婚的獨特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文化中的語言要素在臺印客家通婚中占有重要性，但是同為客家人的女性婚姻移民，與臺灣的客家男性通婚之後，因為同說客語，雖然可能有腔調與用詞上的不同，不過溝通問題較小，甚至在結婚初期因相同語言可起安慰作用，因為甫離開家鄉，嫁作人妻的印尼客家女性，通常到臺結婚後立刻進入夫家家庭，雖然與丈夫的客語並非全然相同，但是丈夫可以以妻子熟悉的客語安慰之。

然而，對於原來非客籍之婚姻移民來說，家庭影響著他們的客語能力。黃玉玲（2014）以桃竹苗地區客籍家庭中，來自越南、中國、緬甸、泰國、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的女性婚姻移民為研究對象，探究他們的客語聽說環境與口語表達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影響移民客語能力的環境因素中，以家庭聽說環境達到高顯著性，移民主要使用客語的對象是家庭成員。此外，其他的影響來自鄰居、朋友與在工作中互動的對象等以及在整體生活環境中使用客語的頻率。由此可見，家庭環境固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若要讓客語能力增強與持續，家庭之外的環境更值得注意。雖然語言極具重要性，但是若細部探究移民的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將會發現華語的優勢與客語的危機。吳孟擘（2014）以苗栗縣公館鄉的東南亞婚姻移民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方式，

4 相對於臺印客家通婚中的文化因素，張書銘（2002）針對「越南新娘」仲介業之運作所進行的研究發現經濟利益取向與最大利潤之市場化是臺越婚姻網絡特色，或是如蔡雅玉（2000）、張鈺平（2004）皆認為臺越婚姻與經濟取向或政治經濟有關。

針對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的移民之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婚姻移民華語與客語之聽說能力皆達顯著差異，婚姻移民均具備良好之華語聽說能力，因此可以觀察到移民的華語之掌握程度優於客語。對移民而言，華語是最主要的語言使用工具，客語僅分布在低階使用場合，尤其家庭場域是客語最主要的使用場所。

由上可以斷言華語之工具性動機高於客語，過去 Chen (2022) 對於臺灣新竹地區閩南語和客家語的語言轉變程度進行跨時代性的探討⁵，在 1978 年，van den Berg 發現，在商業的交易中，閩南地區的顧客比客家地區的顧客更多地使用臺灣華語⁶。但在 Chen (2022) 的研究發現，2015 年的觀察結果則與 van den Berg (1988) 的調查結果相反。客家地區比閩南地區更常使用臺灣華語。這種變化的原因為人們居住環境的擴大，客家人在與其他族群的人交往時機增加，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機會亦隨之減少。綜上所述，客語之融合性動機高於工具性動機。就語言態度來說，華語、客語應具有互補關係，為功能取向，僅為語言功能取向的轉移，而華客語扮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今日客語逐漸向華語方向進行語言轉移之情況，這亦反映出臺灣當今客家之語言困境。此外，客家人在臺灣的比例低於閩南人，在社會交流語言場合極難說出客語，這樣的現象使得客家人對語言使用更加敏感，即更有可能使用社會更重視的高階或標準語言 (Chen 2022: 275)。

語言的使用及認同形塑息息相關，鍾鎮城、黃湘玲 (2011: 693-

5 該研究為 1978 年和 2015 年調查數據的比較。

6 原文為：In 1978, Van Den Berg found that customers in the Minnan area used Taiwan Mandarin more than customers in the Hakka area dur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Chen 2022:275)

716) 以高雄縣美濃鎮客籍移民女性（來自印尼與越南）為研究對象，研究場域在婚姻移民學習華語的教室，研究發現她們皆以客語及華語（在臺灣學習華語）為最主要日常口語溝通語言，但以華語作為主要書面語言，而且華語的使用對移民在自我認同建構上具有關鍵作用。除了華語及客語之外，移民當然也會使用原來國家的語言——越南語及印尼語，因此在多元語言使用的過程中，觀察到移民與外在世界互動時，維持平衡與自我調適，同時在建構自身認同。

就客家地區東南亞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情況來說，根據過去研究成果可知，苗栗公館民國 101 年 11 月東南亞婚姻移民人數有 287 人，其中印尼 178 人，越南 93 人，泰國 6 人，菲律賓 6 人，馬來西亞 4 人（吳孟擘 2014：35），其中印尼佔絕大多數。該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總共回收 85 份問卷，其中母語為客語的有 28 人，其次是越南語 24 人，廣東話 10 人，印尼語 7 人，閩南語 7 人，泰國語 4 人，菲律賓語 4 人，華語 1 人。該研究分析這 85 份問卷指出，這 85 位婚姻移民有八成以上認為自己的華語聽說能力在流利以上，有意思的是，身處客家庄的婚姻移民在客語的聽說能力有將近一半認為自己是流利以上，至於婚姻移民有九成以上對自己原屬國標準語的聽說能力表示相當好，不到一成表示流利，換句話說就是百分之一百認為自己仍能流利使用原屬國的標準語。這份研究還指出，這 85 位婚姻移民的問卷分析可知，華語仍是婚姻移民使用的主要語言，即使在家庭中的語言使用，也只有與公婆使用的語言以「客語」佔的比例最高，其餘如與配偶、與配偶手足親戚、子女與配偶、與子女、子女與祖父母均是以華語居冠，而其他如教育場域（子女學校教師、識字班等）或公共場域（工作上司、上班同事、公

務員、醫生、陌生人等)均以華語為優先使用語言(吳孟擘 2014: 51-65)。

高雄美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 6 位參加「來去移民華語」中級班的美濃婚姻移民所做的討論。這些婚姻移民學生的年齡約在 21-30 歲之間,來臺約有八年之久,其中有兩位來自越南,越南語及客語均流利,四位來自印尼,印尼語及客語均流利,來臺後日常溝通最常使用的語言是華語、客語和閩南語。該研究指出:「客語是她們在家中與公婆交談時,最常使用的語言」,而他們「普遍認為自己的華語使用能力不足……,且在需要填寫書面表格文件時,對於華語文字的辨讀與書寫感到困難。」(鍾鎮城、黃湘玲 2010: 703-704) 這個研究最有意思的是指出婚姻移民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客語扮演了重要角色,該研究提到:「在華語教室裡,華語及客語之間的口語語碼轉換情形相當頻繁。」「當她們在課堂中的華語學習與生活或語言經驗相關時,客語是她們用以連結的使用媒介,主因在於客語承載了日常真實生活的知識與意義。」(鍾鎮城、黃湘玲 2010: 708-709)

以上的研究前提將「客語」視為同質性高的單一語言討論,事實上客語在臺灣有不同腔調,在東南亞也是,相關研究指出:「印尼客家話與臺灣客家話的腔調與用詞有別,例如,來自山口洋的阿佳提到她是說海豐⁷,但家鄉在桃園龍潭的先生操四縣腔,所以他們之間卻多用『國語』溝通……,或是例如莉芸發現與丈夫溝通上容易因為用詞不同而無法順暢溝通,例如在印尼冰箱稱為『雪櫥』,稱電扇為『風扇』」(蔡芬芳 2017: 286-287)。

7 「海豐」在臺灣命名為「海陸」,「海陸」是「海豐」和「陸豐」的合稱。

本文訪談資料顯示，桃園楊梅地區的婚姻移民來臺時約 20 歲左右，目前年齡多為 30 至 40 歲上下，小孩子多數在國小階段，從事的職業以家管、開小吃店或炸物攤居多。這些婚姻移民來自印尼、越南、泰國，其中以來自印尼居多，根據受訪者的觀察，原因是越南多廣州人，泰國多潮州人。而受訪的婚姻移民多半來自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島（坤甸、山口洋、百富院等地）。遠嫁臺灣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在印尼使用的語言是客語和印尼語。很少人是來臺之後才學客語，都是來臺學習華語。印尼客語與臺灣客語的相似度約 90%。根據目前的訪談資料，桃園客家地區的婚姻移民（以印尼來臺為例），與家人（老公、小孩、公婆）溝通時使用客語及華語，與同鄉友人交談使用客語及印尼語，與非同鄉友人交談則使用印尼語，手機傳訊息則使用印尼文。在「臺印喜悅協會」及「富岡榮耀教會」可以觀察到這些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情況。⁸

三、語碼轉換及標記理論

本文以桃園市楊梅區作為研究場域，該區本身就是一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即該地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楊梅主要使用四縣以及海陸客語兩大腔調，由於接觸頻繁，兩種腔調彼此之間在語音、詞彙、語法等都多有融合，一般會以「四海話」稱之（羅肇錦 2000）。在楊梅這樣的語言環境下，客家婚姻移民從印尼來到臺灣生活，基本上皆具有華語以及自身母語（客語）的語言能力，可以在這些語言之間自由轉換。

婚姻移民所使用的客語可以區分為「軟話」和「硬話」（黃惠珍

8 此為根據研究者訪問薛常威醫師所得到的資訊。

2008)，其中「硬話」，在研究者耳聽下較接近臺灣的海陸客語，使用這些客語的居民多來自印尼的山口洋（Singkawang），使用硬話的居民祖籍多來自中國廣東揭西一帶。而「軟話」在研究者耳聽下則較接近臺灣的四縣客語，使用軟話的居民多來自印尼的坤甸（Pontianak），「軟話」的使用居民祖籍多來自中國廣東梅縣。而在婚姻移民的軟話、硬話之中，研究者注意到完成式使用「核」而非「忒」，居住用「歇」而非「戴」。山攝三四等字主要元音（vowels）較低，流攝三等字的介音（prenuclear glide）還存在。

本文使用的「語碼轉換」，意指「在同一句話，或是同一段話之中，使用了兩種或是兩種以上不同系統的語言」，這樣的現象經常出現在雙語（bilingual）或是多語（multilingual）社區之中。在臺灣，關於婚姻移民、客語「語碼轉換」的研究相對較少，例如本文所提及吳孟擘（2014）、黃玉玲（2014）等研究主要指出客語在這些臺灣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情形，鍾鎮城、黃湘玲（2010）的研究則是對於族群身份認同的面向。為了進一步觀察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機制，本文使用「標記理論」（markedness theory）解釋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情形。

Myers-Scotton（1993）所提出的「標記理論」用以解釋語碼轉換的社會動機，並透過「協商原理」（negotiation principle）來說明語碼之間的轉換策略，我們在這套架構之下可以知道，所有的語碼選擇都是說話者根據協商原則而決定（Myers-Scotton 1993: 113）。簡言之，本文所使用的「標記理論」是假定每個說話人在說話時是有一套既定的約定俗成或是標準的語碼選用原則，而根據這樣的準則所說出來的語言就稱之為「無標（unmarked）語言」，反之，違背上述所說的這套準則而指定

刻意選用的語言稱為「有標 (marked) 語言」。

標記理論將語言形式的選擇，視為說話人的理性語碼選擇。某種特定語碼它是否具有標記性的取決即是在說話參與人之間的「權力和義務關係⁹ (right and obligation set)」，說話人會根據自身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做出選擇後可能得到的回報 (cost and reward) 去選擇不一樣的語碼。就如同 Sharma (2018) 的研究是討論在美國擔任節目主持人的印度移民，他的受眾主要是美國人。因此在這種情境下，主要使用的是美式英語，被視為一種無標語言，至於印度口音的英語的使用是只有在主持人特別想要表達自己的立場時才會出現。又根據協商原則，在說話的當下，說話人可藉由語言形式的選擇去標記他希望和受話人之間所建立的權利和義務關係 (Myers-Scotton 1993: 133)。

若是一種語碼的選擇，與說話人所認同的權利和義務的預期相同時，則該語碼為無標選擇，也就是說，無標選擇是說話環境的一種可以預測行為；反之，若說話人希望建立另一種權利與義務關係，說話人則會捨棄無標語碼，並刻意使用另一種語碼，這樣的情況則為有標選擇。這樣的改變是跟無標的權利和義務相互協商之後所得到的結果，換句話說，說話人可以透過協商去改變本身說話參與人之間所預期的社會距離。結果有兩種，第一則是可以縮小距離（即是使用有標語碼去標誌相同的族群認同），也有可能因此擴大距離（即是藉由有標的語碼去表示權威或憤怒）。

標記理論其實要告訴我們的是語碼的轉換標記最主要還是取決於協商原則以及其衍生出的三個信條，分別是：無標選擇信條 (the un-

9 本研究在此依照意義翻譯為權利義務關係，而非字面翻譯。

marked-choice maxim)、有標選擇信條 (the marked-choice maxim)、試探性選擇信條 (the exploratory-choice maxim)，而這樣子的語言協商現象在 Myers-Scotton 的研究 (1993) 中已有諸多論述，於本文即不再贅述。

我們將在 Myers-Scotton (1993) 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去研究客家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的類型以及其背後的動機。我們把訪問的所有語音資料進行語碼轉換的結構以及次數分析，然後運用標記理論探討相關案例，最後從社會語言使用的角度去解釋語碼轉換的功能，期以檢視婚姻移民所說的客語以及語碼轉換之間的關係，提供相關研究與理論進一步的探討根據。

「語碼轉換」一詞，過去學界對於其相關定義存在差異。本文為了明確語碼轉換的定義，必須區分語碼轉換、語碼混用、雙言以及借用等幾個概念。首先有些學者 (例如 Auer 1990) 將語碼轉換解釋為句間的轉換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而語碼混用則指的是句內的轉換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因此，語碼轉換發生在句子分界處 (clause boundary)，換言之，是句子和句子之間會出現。而語碼混用發生在句子內部，也就是在句子內部出現不同的語種。然而，僅從結構和轉換發生的位置來定義這些術語過於簡單，不夠準確 (何自然、於國棟 2001)。大多數學者認為語碼轉換可以概括句間語碼轉換和句內語碼混用，本文也傾向支持這個觀點，而在本文之中的舉例，為使句間的轉換與句內的轉換更加分明，因此在標記語碼時，發音人一旦轉換語言，本文記錄時即進行標記，以確保句內的語碼轉換出現。

另外祝畹瑾 (1992) 指出，語碼轉換是指在同一次對話或交談中使

用兩種或更多的語言變體；Gibbons（1987）則認為，在語碼混合（即語碼混用）中，語碼 A 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被納入了另一語碼 B 中，通常情況下，B 語碼佔主導地位，而 A 語碼則處於輔助、次要的地位，不像 B 語碼那樣被人們有意識地使用。與語碼轉換不同，語碼混合給人的感覺只有一種語碼，這樣的情況 Gibbons 稱之為「MIX」。

本文所使用之音檔由碩、孟、卓三人進行訪談以及轉寫。本文所呈現之逐字稿轉寫之中，華語以漢字表示，英文以英文字母表示，客語與閩南語則是以教育部所規定客語漢字以及閩南語漢字表示。客語的字體以斜體表示，閩南語以底線表示。再者，若是發生語碼轉換時，本文會在發生的地方加上 *** 表示語言的語種進行轉換。除此之外，各個語言之間的語碼轉換情形會由語碼符號加上數字進行表達，於前語碼英文是表示說話人正在進行的語碼種類，後面的數字則是表示轉換後的語碼種類。這樣的區分方式是更讓研究者更可以明白何種語言的依賴性最高。轉寫規則中，婚姻移民所說的客語與臺灣兩大通行腔（即四縣、海陸客語）相差程度不大，在印尼，「軟話」與臺灣四縣客語較相似；「硬話」則與海陸客語較相似。因此在文中雪、麗二人所用的四縣客語、海陸客語，即是婚姻移民所說的硬話與軟話，各語言符碼如下所列：

M：華語（國語） S：四縣客語¹⁰ H：海陸客語¹¹ L：閩南語 E：印尼話

1：華語（國語） 2：四縣客語 3：海陸客語 4：閩南語 5：印尼話

舉例來說，若該句是由華語轉換成海陸客語，文中以 < M3 > 做出

10 本研究亦指受訪人「麗」所說的印尼坤甸客語。

11 本研究亦指受訪人「雪」所說的印尼山口洋客語。

標記，若是從海陸客語轉換回華語則是會使用 < H1 > 進行表示，為使語言的進行能夠清楚，者會在每一說話人的開頭進行語言的標記，如：雪：< H > 係啊係啊。每一段落之對話開頭之標記，僅標記發語語碼，發生語碼轉換時方加上 *** 表示語言的語種進行轉換類型。從 A 到 B 的語碼轉換標記，是從英文字母轉換至數字，如此標記方式可以讓我們知道說話人對於語言的使用程度，從海陸客語轉換回華語則以 < H1 > 標記，表示這段語碼轉換的起點與終點。此外，假若在語料轉寫過程無法確定某些語助詞（例如〔o24〕、〔ho31〕、〔he31〕、嗯等）究竟屬於何種語言的時候，本文的標記將這樣的語助詞歸類在當時正在進行的語言之中。

本文的談話設計從三個部分切入，第一部分是對於雪、麗二人的婚姻切入進行聊天，第二部分則是從印尼的宗教多樣性以及身為印尼華人的成長故事，第三部分則是緊扣來到臺灣之後的生活，有關育兒，又或是對於自身初次到臺灣不習慣之處。為何會選擇此三項主題進行切入的點在於，這些婚姻移民大多是透過婚姻的方式嫁到臺灣，而多數婚姻移民是透過媒妁之言、相親等方式認識另一半，藉此引發受訪人興趣，進一步使受訪者說出更多其生活相關談話內容。

再者，因雪、麗二人皆是印尼客籍華人，對自身有客家認同，而雪、麗二人在印尼的成長階段，正是經過了印尼蘇哈托時期，當時政府種種政策多是不利於華人，因此第二階段從此切入。最後的訪談則是聚焦在「民以食為天」的飲食主題，以及初到臺灣時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以藉此希望了解研究參與者更多的想法或感受。

本文所要探討的三段主題對話之中，華語及客語均視為無標語言，

原因是本文研究參與者仍在職或在學；客語在本文之中亦是對話中的無標語言（Sharma 2018），因為在場的六位皆是擁有客家認同的客家人，若有例外，則會另外說明。

四、楊梅婚姻移民語碼轉換標記的結構分析

本研旨在探究語碼轉換，透過田野調查的語音資料，筆者選擇三段不同討論主題的對話進行標記性的結構分析，並檢視與分析每一位說話者語碼語言轉換的情形。首先的一段對話是詢問雪、麗在二十年前如何來臺灣的故事以及和配偶相遇的經過。雪、麗二人雖說是婚姻移民，但二人皆嫁來臺灣超過二十餘年，早已將華語（國語）視為第一說話語言，由標記理論告訴我們的概念，如此說話場景，華語、客語在此已成為無標語言，其他語言為輔。第二段對話是詢問印尼當地宗教的多元樣貌以及政治變遷，此處可能因為觸及敏感話題以及專有名詞等因素，因此依舊以華語為主，但同時印尼語進入比例升高。最後第三段對話是雪、麗二人分享初到臺灣時的不適應，以及懷念家鄉美食，在這段對話中，兩人華、客語交錯使用。以下先行說明本文語言結構之計算方式，之後則進行三個場景的語言轉換結構分析。

本文從標記符號進行統計與分析，分析的結果以表格呈現。其中縱軸為語碼的形式，也就是該段談話之中所有從 A 語碼轉換到 B 語碼的形式，橫向則是呈現人物在該段談話之中的所有語碼形式次數展現，即是 X 人在本段談話共計轉換了 Y 次語碼。此外在語言轉換之處亦會統計該段對話之中總共出現的語碼轉換次數，進行次數百分比的計算，也

就是說結構分析的表格之中，會出現研究參與者的語碼轉換計算，也會出現語碼轉換的次數計算，因此表格內數字不一定能夠整除，筆者在計算出的百分比數字則是四捨五入保留小數點後兩位進行微調，以確保數值的整齊。以上是本文語碼結構分析的計算與呈現方式。

以表2為例，從雪的談話可以發現其語碼轉換標記有 < M3 > 18 次、< H1 > 20 次，共 38 次語碼轉換，約佔所有轉換「總數」127 次中的 29.92%。而以各語言別計算，例如 < M3 >，標記此語碼之人物有雪 18 次、孟 3 次、卓 2 次，共 23 次，第一段對話語碼轉換共 127 次，< M3 > 結構占「總數」127 次之中的 18.11%，以此計算方式類推至第二段、第三段對話。

表 2 第一段對話的結構分析

場景：於雪女士家中的聚會 閒聊主題：如何來臺灣的故事以及和配偶相遇經過																
轉換類別	< M2 >		< M3 >		< S1 >		< H1 >		< S4 >		< L1 >		< L2 >		總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語言轉換	37	29.13	23	18.11	37	29.13	26	20.47	2	1.57	1	0.79	1	0.79	127	100
雪	0	0	18	47.37	0	0	20	52.63	0	0	0	0	0	0	38	29.92
麗	33	47.83	0	0	32	46.38	0	0	2	2.90	1	1.45	1	1.45	69	54.33
碩	4	50	0	0	4	50	0	0	0	0	0	0	0	0	8	6.30
孟	0	0	3	42.86	0	0	4	57.14	0	0	0	0	0	0	7	5.51
卓	0	0	2	40	1	20	2	40	0	0	0	0	0	0	5	3.94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根據表 2 所示，我們發現在主題一的語言轉換之中，以麗的轉換 69 次最多，以卓的次數最少，二者的相差的轉換次數差別達 64 次。在本段談話中語言轉換最多樣的也是麗，次數百分比占全談話人的一半以上。且在談話之中，雪、麗二人因為來自印尼的不同地方，因此說的客語不同，以致語碼轉換的語言標記中，雪僅有 < M3 >、< H1 > 兩種語言標記。但是麗的家庭背景稍微不同，麗的父親為潮州人、母親為客家人，在談話中麗將潮州話與閩南話畫上等號，因此在本段談話之中僅有麗使用 < L1 >、< L2 >、< S4 > 等與閩南語相關的語言標記。因為在聊天的環境之中，僅有麗的背景與閩南有接觸，但又因為眾說話人多以客語進行交談，因此語言轉換標記之中，當麗說出閩南語時，僅出現在連接詞「攏總」以及自稱名詞「家己」。

表 3 第二段對話的結構分析

場景：於雪女士家中的聚會 閒聊主題：印尼當地宗教的多樣以及當地政治的變遷																		
轉換類別	<M2>		<M3>		<M5>		<S1>		<S5>		<H1>		<E1>		<E3>		總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語言轉換	14	28	7	14	5	10	11	22	1	2.0	4	8	7	14	1	2	50	100
雪	0	0	4	33.33	2	16.67	0	0	0	0	3	25	3	25	0	0	12	24
麗	5	33.33	0	0	3	20	3	20	1	6.7	0	0	4	26.67	0	0	15	30
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0	1	2
碩	6	50	0	0	0	0	6	50	0	0	0	0	0	0	0	0	12	24
孟	0	0	2	66.67	0	0	0	0	0	0	1	33.33	0	0	0	0	3	6
卓	3	50	1	16.67	0	0	2	33.33	0	0	0	0	0	0	0	0	6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二段主要對話主題聚焦在印尼當地宗教的多樣以及當地政治的變遷，根據表 3 的整理，我們看到語碼轉換次數最多的人次依舊是麗。但是在這整段對話之中，我們可以與第一段對話相比，可以看到語碼轉換的總次數明顯降低。可能原因是因為本段對話聚焦於印尼當代社會政治以及家中宗教因素，與其他閒聊內容較為慎重，因此多使用華語，進而導致語碼轉換次數大幅度減少。在第二段對話之中，出現印尼語的語碼轉換現象，轉換內容經詢問後，幾乎以印尼當地人物、學校名稱等專有名詞的出現，才讓麗、雪以及道先生使用印尼語。¹²

表 4 第三段對話的結構分析

場景：於雪女士家中的聚會 閒聊主題：二人初乍到臺灣時的不適應，以及介紹家鄉美食的主題																		
轉換類別	<M2>		<M3>		<M4>		<M5>		<S1>		<H1>		<E1>		<L1>		總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句中轉換	9	22	11	27	1	2	1	2	8	19.5	8	19.51	2	5	1	2	41	100
雪	0	0	3	30	1	10	1	10	0	0	3	30	1	10	1	10	10	24
麗	4	100	0	0	0	0	0	0	4	100	0	0	0	0	0	0	4	10
道	0	0	4	50	0	0	0	0	0	0	3	37.5	1	12.5	0	0	8	20
碩	4	100	0	0	0	0	0	0	2	50	0	0	0	0	0	0	4	10
孟	0	0	1	50	0	0	0	0	0	0	1	50	0	0	0	0	2	5
卓	1	20	3	60	0	0	0	0	2	40	1	20	0	0	0	0	5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2 表 3 道先生的 <E3> 語碼轉換，為華語音檔中第二段音檔是以印尼語做結束，但進入在第三段對話之中轉變為海陸，因此出現此標記。而此處的語碼轉換需要進行標記的原因在於第二段談話語境，為討論印尼政治，道先生的語言是說明印尼總統的名字，進入到第三段對話時說客語，本研究主要探討婚姻移民之語言使用，但道先生之語碼轉換為影響雪、麗二人之語言使用，因此標記之。

最後一段對話是聚焦在有關雪、麗二人剛到臺灣的文化不適應，以及介紹家鄉美食進行閒聊。根據表 4 的整理，這段對話的語碼轉換次數又較第二段對話少，但是與對話二較有差異的地方是，第三段對話首次出現 < M5 > 還有在第一段對話出現的標記 < L1 >。< M5 > 出現的唯一地方是雪在分享印尼料理時，因為使用華語介紹種類繁瑣的印尼美食時，對麗說出的印尼語。至於 < L1 > 這個語碼變化標記在第三段對話之中是個特殊點。行文至此，凡是說至與閩南、潮州相關之說話人，皆是與麗有關，但是在第三段對話之中，做出 < L1 > 這個標記的說話人是雪，而轉換的內容為「落跑」這個語詞，我們可以知道這樣具有臺灣語言特色的語碼轉換亦進入到婚姻移民的語言系統，可謂生活語言在地化的展現。

最後筆者將三段對話的主題整理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 5 本文對話主題與特色

	場景	主題	對話特色	轉換次數最多
第一段對話	雪家中的聚會	如何來臺灣的故事以及和配偶相遇的經過	僅有麗使用 < L1 >、< L2 >、< S4 > 等與閩南語相關的語言標記。	麗
第二段對話		印尼當地宗教的多樣以及當地政治的變遷	聚焦於印尼當代社會政治以及宗教。 專有名詞的出現，才讓雪、麗、道使用印尼語。	麗
第三段對話		二人初乍到臺灣時的不適應以及介紹家鄉美食的主題	分享印尼料理，雪使用華語介紹種類繁瑣的印尼美食時，對麗說出的印尼語。	雪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整理上述三段對話主題之後，可以發現，在第二段內容多談論

政治、宗教以及專有名詞的出現，才讓雪、麗、道使用印尼語。這樣的現象本文認為是社會語言學所關注的，當說話者在談話、涉及意見（*opinion*）這類較正式的話題時，會傾向使用該社群的標準語（Labov 2002）。也就是說，在對話二內部的語言轉換標碼為何會在印尼語轉換至華語的標碼（<E1>）頻率提高。

五、楊梅婚姻移民語碼轉換的結構 與社會動機

本文運用標記理論，對楊梅婚姻移民語碼轉換的語料進行分類，並且探討引發語碼轉換這個動作背後所隱含的社會動機。Myers-Scotton（1993）的研究所提出的諸多選擇信條以供我們在錄音後對於語言進行標記，這些信條所代表的意涵即是，當聽話人改變時，說話人所採取的語言會不相同。若是就本文來探討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現象，則是需要就他們身邊的說話人以及聊天主題來探討。

本文探討的這三段對話的參與人全部共有六位，身份說明於研究方法段落已說明，然，這邊要補充的部分的是，麗的母親為客家人，父親為潮州人，雪的父親為客家人，母親已經過世，訪談者未多加詢問，本文說話者六人之中，除了卓為四縣、海陸語言轉換流暢之外，其他五人在本文的音檔之中出現的客語僅有一種腔調，分別為：

海陸客語：雪、道、孟

四縣客語：麗、碩

Myers-Scotton（1993）的研究道出語碼轉換的時機，通常是在句子

與句子之間，第一段對話我們要關注的重點在於說話人之間的對話是如何影響雪跟麗的語言選擇。換句話說，「族群」是一個情境，為使語言之間的流暢，語言之間的選擇會經過篩選。主客之間，語言的選擇大多會是主跟隨著客。因此套用到本文的情境，即是身為主的雪，多跟隨身為客的麗、碩、孟、卓。我們先看以下對話：

對話 1)

雪：< M > 閩南人，閩南人，算閩南人…

麗：< M > 就閩南人 *** < M2 > 潮，潮州，佢兜儕到印尼嘍，斯講這四縣啦！毋係講該海陸，佢四縣都講無麼个，嘍嘍嘍，無麼个轉…

雪：嘍嘍嘍嘍 *** < M3 > 毋怕…

上段對話可以看見，麗因為身分是潮州加上客家，而雪、麗二人對於潮州的定義與閩南畫上等號。對話之中，麗因為用華語說不出潮州的觀念，因此使用客語接著介紹潮州以及印尼的四縣客語，又因為來自坤甸的麗不會說海陸客語，稱自己「講無麼个轉」，而這時的雪也發現這樣的語碼轉換情形，因此對麗的無法在四縣、海陸客語進行轉換表達諒解的回答：「毋怕」。

主與客之間的對話會出現主遷就客的現象產生，若是這樣的情形發生在客人之間的話，筆者認為亦會出現一種客人之間的遷就，因為年紀的關係，麗與雪二人年紀相仿，但碩、孟、卓三人年紀較輕，且年輕人的語速較快，於言語表達上佔有稍微強勢的現象，因此麗、雪會被碩、孟、卓三人所說的語言所遷就，說出碩、孟、卓三人前一句說出的語言，換言之，即是華語詢問，以華語回答。若是用客語，則是使用客語回答。

我們看底下的例子：

對話 2)

雪：<H>讀書兜全部，該讀書。佢兜像佢兜讀書啊該*** < H1 >
老師 *** < M3 > 有規定你講。在學校愛講印尼話，做毋得講 *** <
H1 > 母語…

麗：< S > 會罵，因為該排華，係 *** < S1 > 比較排華…

卓：< H > 係啊…

碩：< S > 就去屋，屋下正會講客，潮 *** < S1 > 潮州話 *** <
M2 > 恁仔…

雪：< H > 係…

麗：< S > 係 *** < S1 > 因為 *** < M2 > 佢爸有規定嘍，到屋
下毋好講印尼話，佢兜儕毋肯，佢兜儕正會講，這下嘍，到印尼恁多个
細人嘍，毋會講這 *** < S1 > 母語了 *** < M2 > 佢兜儕仰講印尼話，
出去講印尼話，屋下又講印尼話 *** < S1 > 那就是，講他們的印尼話…

上段對話其實可以展現出，當卓、碩二人以客語為該句子的結尾，雪、麗即會以當前結尾語種，也就是客語進行回答。而這樣子以結尾語種影響下一位說話人說的語言的現象並不限制在本文中的年輕人身上，這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婚姻移民雪、麗之間，從(2)之中，當碩以「恁仔」做為結尾後，第一影響的即是雪說出的應答詞「係」，間接影響到麗亦使用客語應答。

對話 3)

雪：< M > 我也是啊，因為我公公，雖然是那個單子我老公會繳，
不過我公公看到那個單子來還是 *** < M3 > 嗯，毋知這係無，收金賣

聲，呵呵呵，*** < H1 > 你聽得懂嗎…

孟：< M > 那什麼…

雪：< M > 收黃金賣那個賣鑽石呵呵呵…

麗：< M > 他講好深喔…

雪：< M3 > 生理做到恁大，這電話愛打到恁貴恁多錢呵呵呵……

麗：< M > 你還沒一萬，我還一萬多塊，我婆婆說，可以打，講不要講太長啊，她又怕我生氣，又講說，就這樣後來我就知道，我就去外面打…

這段對話是第三段對話之中，雪、麗剛來臺灣時，因為相思而哭泣，使長途電話費用暴增的情況。與（2）不同的地點在於麗在雪之後說的客語，這段就不以客語進行回答，取而代之的語言是使用華語，我們對於這段互動的解釋是，因為後面麗的回答與雪的情況不同，麗為了說明自己的處境，因此使用在他們與言系統之中較高層級的語言進行回答，而這個較高層級的語言即是華語。

對話 4)

麗：< M > 因為你又那麼快就有小朋友，我又那麼多年嘍，我去上班，我那朋友家的打電話說：你嘍，不要常跟他出去他說 *** < M2 > 佢講佢恁答滴，講你毋好透下同佢，佢驚佢出去 *** < S1 > 給他教壞了…

「閒話八卦」（gossip）在社會行為之中不可避免，臺灣社會之中，若是配偶為非本國籍的配偶，則另一半會多擔憂其在外的交友情況。上段對話 4) 即是麗與雪講當時剛來臺灣交朋友的情況，語碼轉換於閒聊八卦時會出現在華語轉客語的轉換上。「答滴」在客語本就具有貶意，

但在對話 4) 之中談及家中孩子事務、或是周遭發生一些使他人討論的事件時，在麗說話當時，筆者亦觀察到麗於此對話之中的語氣進行了刻意轉換，且在轉換後的客家話，有明顯的放低音量，此處本文推斷為有標語言之處，在此應是華語之中找不到相似詞能夠說明此現象，因此麗才從客語之中尋找出「答滴」一詞進行表達。

對話 5)

雪：< H > 你係較多個，該啲 *** < H1 > 幫傭 *** < M3 > 有無，該 < H1 > 幫傭 *** < M3 > 全部都係本土人，全部都係講印尼話，所以該細人踎等該 *** < H1 > 幫傭 *** < M3 > 全部都講印尼話，你係做爺衰個人，無閒出去開店做生意麼个，啊該細人該 *** < H1 > 小朋友 *** < M3 > 全部都，分該 *** < H1 > 幫傭帶啊 *** < M3 > 佢啲，變到全部都講印尼話了啲啲啲…

麗：< M > 我也都 *** < M2 > 無麼个曉講…

雪：< H > 係啊…

麗：< S > 像佢兜齊這幾代啲，有規定啦，吾爸會罵，屋下做毋得講印尼話…

麗：< S > 係啊，自家斯華僑…

碩：< S > 在屋下做得講客喔…

雪：< H > 做得啊…

麗：< S > 做得啊，做得啊…

這段對話是說到印尼當地的語言通行，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 H1 >、< M3 > 兩個標記在雪身上出現了許多次，內部包著的詞語皆是「幫傭」以及「小朋友」，這樣的標記出現說明著，婚姻移民在臺灣的語言情況

亦是相同，或許是因為雪、麗二人在臺灣已經二十餘年，對話模式除客語外，多為華語，因此對於自己不熟悉的客語詞彙，下一個替換的語言的選擇為使所有聽話人皆能接受，在篩選條件下，雪、麗二人僅能挑選華語做為客語外的第二表達語言。

對話 6)

碩：< S > 就嚟*** < S1 > 可能其實，之前沒有辦法到，到外面吃東西這樣，還是說那個時候其實外面也沒那麼多印尼的…

卓：< M > 雜貨店或是小吃店…

麗：< M > 不是這樣子，因為那時候出去也不方便，因為那時候住鄉下，他每次要等我先生，那時候他做鐵工，他還沒上班，我每次要等他回來，才可以帶我出去，因為鄉下要去哪裡，那時候也沒有摩托車，那時候我會騎摩托車，那時候還沒有買摩托車，我每天就等他回來，後來就慢慢有工作，有去上班，又慢慢有朋友，又還好，朋友會帶我們，假日帶出去，才可以去外面吃東西，雖然每天都這樣子，你看，一個在印尼住習慣，一來這裡，每天在家裡，又語言不通，還好我婆婆都會講一下話就這樣子，後來就，就要等到老公很晚才回來，整天這樣子你看，電視又看不懂…

孟：< M > 喔對…

麗：< M > 都在幹嘛，以前又沒有手機…

語言的過渡是一個特殊的現象，這邊我們發現說話參與者只剩下麗、孟、碩、卓，有趣的是，這段算是麗一人在訴說在當時嫁來臺灣的情況，說自己的交通不便，僅能透過老公的接送，到近十年才能夠去哪都不求人。這邊主要針對的並不是語碼轉換的部分作出解釋，我們是要

對於字詞音的探討，當麗說出「摩托車」這個詞的時候，因為在印尼語中的摩托車的「托」字是不送氣的〔t〕音，而麗的華語表現，說「摩托車」亦跟尋此語音規則，讀音從「摩托車」變成「摩都〔to⁵⁵〕車」。此為華語與印尼語的語音接觸融合。

對話 7)

碩：< M > 所以那時候，所以就是，來的時候就，慢慢的全 ***
< M2 > 全部都過來…

麗：< S > 係佢來差不多，四年五年 *** < S1 > 差不多四年五年，就他們就繼續來了，有來一下就回去，有來玩而已，後來後面就我哥哥有固定有工作，他就說給我媽媽他們做身分證，就還是我擔保，那時候因為我身分證也先出來，後來我就擔保我哥，擔保我媽我爸，後來他們兩個出來我就擔保，他們自己就擔保我弟跟我妹他們就可以這邊有身分證，然後就固定了…

最後，這段對話是麗與碩的對話，內容是在約二十年前來臺灣辦身分證的種種情況，婚姻移民來臺若是需要辦理身分證，除了透過婚姻，基本上都是需要有人擔保。這段對話看似平凡無奇，但是本文認為，這段對話因為是麗將其過往訴諸在場的聽話人，麗的詞素（morpheme）大多圍繞在身分證、擔保等現代詞彙，因此麗選用了在他的語言系統中較為高階的語言，也就是華語，來進行這段對話，以便於其自身說話的流暢。由於訪談者亦有參與此段對話，因此對於這段對話本文也做出另一解釋：因為這段話的問話人是碩，他本身掌握客語的能力較差，說客語的語速較慢，因此麗察覺此事，而在麗回答碩的問題後，自身回答問題的語言也從客語轉變回華語。

六、楊梅婚姻移民語碼轉換 的社會語用功能分析

社會語言學本身是需要深入觀察的一門學科，從拉波夫（William Labov）對於紐約市內部的語言研究（1966）開始，學界開始對於社會以及語言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的探討。尚秀紅（2010）、蔣滿英（2019）分別在大學校園做為研究場域探討大學生的社會語用功能，其中尚秀紅（2010）提出了幾項大學生社會語用的功能有便捷功能、緩和語氣功能、強調功能、製造幽默氣氛功能等等。蔣滿英（2019）則是提出大學內部的幾種語碼轉換的模式，分別有普通話與方言的轉換、普通話與流行語的轉換、普通話與外語的轉換。蔣滿英在其研究之中提及了其研究場域的社會語用功能的核心，主要是實現其交際功能（蔣滿英 2019：58），而語用的功能在該文之中有填補語言空缺、使用方便、避諱功能等等。

張淑貞（2001）則透過語言的代號轉換方面進行研究，該研究發現英語、閩南語是代號轉換的主要語言；語用功能為：轉述他人話語、評論、委婉語。她還提出代號夾用的語言包括：英語、閩南語、日語、印度語及德語；而其中又以英語與閩南語夾用佔最大部分。Shih and Sung（1998）以社會語用學的觀點，透過對報章雜誌中閩南語夾雜的現象進行研究，開啟了書面語語碼轉換相關領域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擴展了以往主要以口語資料為主要的研究範疇。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先前針對華語、閩語、英語等語言中的語碼轉換與語言夾用進行的

社會語言學探討已相當豐富，然而缺乏客語的研究。再加上，本文以婚姻移民為研究對象，與其他研究以本國人的研究有所區別，如尚秀紅（2010）則是聚焦在大學學生之間的語碼轉換，蔣滿英（2019）分析大學校園內部師長、學生之間的語言使用，張淑貞（2001）則是以口語語料、廣播節目以及社群網站（BBS）文章進行語言夾碼探討，說明電腦媒體溝通（computer-media communication）的語言夾用關係。因此本文藉由分析客家婚姻移民在客家鄉鎮內的語言使用和社會語用功能，一方面補足社會語言學的相關研究，另一方面亦提供另一種角度了解在臺灣的客家婚姻移民。

曹逢甫等（2012）曾對於新竹地區的客家人進行語碼轉換進行研究，並提出幾個社會語用功能，我們使用標記理論分析了語碼轉換的結構現象，並採用曹逢甫等（2012）提出的社會語用功能分類對語料進行解釋，大致可以分為三點：（1）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ease of expression）、（2）連帶影響（associated effect）、（3）閒話八卦（gossip）分述於下文。

（一）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ease of expression）

不熟悉，亦可稱作便於理解。這樣的現象在語用學中稱「代稱功能」，意思就是當某語言中缺乏可表達某個概念的詞彙時，說話人會移轉到另一個可以表達這個概念的語言。普遍來說，客語缺乏較多現代化、學術以及新興事物的動詞、名詞等，因此多需要借助其他語言，這樣的語用功能也可以說是填補語言空缺功能（蔣滿英 2019：58）。

這樣的不熟悉以及便於理解的轉換現象在前述對話 2）的展現相當

明顯，對話 2) 之中，雪跟麗各出現一次這樣子的現象，雪在一連串客語中說出的華語為「老師」，並非客語詞，但在客語中亦有指老師的名詞為「先生」，但在這邊雪並沒有使用「先生」一詞。至於麗在對話中說出的華語為「因為」，並非使用客語說出連接詞，這邊對於雪、麗二人語言使用，筆者認為，雪和麗二人的語言思考大多以華語進行華語客語的直接轉譯，因此當雪遇到華語客語表達詞素不同的字詞時，即會使用華語進行代稱，出現語碼轉換。麗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一詞在客語中與華語相同，所以麗在此進行的語碼轉換與直接轉譯的關聯性較低。

針對華語的代稱功能還有一段對話可以進行驗證，如以下對話：

對話 8)

麗：< M > 也是我阿姨，我阿姨早就嫁過來，*** < M2 > 佢个阿姨喎，嫁來，差毋多，三十零年了，後來阿姨過身了，無在了，啊佢*** < S1 > 就是 *** < M2 > 介紹吾 *** < S1 > 表妹 *** < M2 > 吾 *** < S1 > 表妹就，那時候才十六歲 *** < M2 > 十六歲還恁細啊，*** < S1 > 後來就 *** < M2 > 吾老公過去，佢還就上班，佢就去佢舅該片寮，佢个 *** < S1 > 表妹喎，就 *** < M2 > 毋中意啦，像著，佢正去个時節，佢舅姆就講，麗 * 你會講客話，客話 *** < S1 > 他說 *** < M2 > 喊佢 *** < S1 > 翻譯，嘿，翻譯，翻譯就，就這樣子，幫他們翻譯，因為他們兩個講不通嘛 *** < M2 > 該兩儕就講講講，啊，就講毋通…

這段對話只有麗一人，說的是麗當時嫁來臺灣的經過，我們發現這段對話中有相當多的語碼轉換，平均落在十個字左右即會切換一次，這

樣的現象即是本文所認為的婚姻移民說客語的思考模式是將華語直接對譯至客語，因此遇到華語客語表達詞素不同的字詞時，即會使用華語進行代稱，例如：對話 8) 內的轉譯內容「表妹」即是華語用詞，並非使用客語對等詞「表老妹」。

(二) 連帶影響 (associated effect)

「連帶影響」即是本文在語碼轉換之社會動機該章節中發現的一個對話模式，連帶影響意思就是前一個說話人結束時所在的語言，會影響下一個說話人的語言選用，不論前一位以及後一位說話人是誰皆有這樣的現象產生。

對話 1)、對話 3)、對話 7) 我們都可以看見連帶影響的出現，對話 1) 之中，當麗用四縣客語說了自己的四縣以及海陸客語之間無法進行腔調之間的互換，接著這樣的連帶影響到了雪的下一句話從原本說華語的語言，轉換到客語來安慰麗說不用擔心；對話 3) 之中，當雪說出了收金賣聲的經過後，用華語詢問了孟，連帶影響也對孟進行影響，使孟也使用華語回答詢問何謂收金賣聲，而後麗也受到雪、孟轉換華語的語境影響，也進而使用華語來表達自身看法；對話 7) 之中則是碩、麗二人的對話，在詢問麗的家人來臺灣的情況，我們看到碩的對話是：「的時候就，慢慢的全 *** < M2 > 全部都過來。」可以看到碩有刻意的轉換語碼到客語，以拉近與麗之間的語言關係，而麗或許發現了這個現象，因此回答時一開始前兩句使用客語應答，但到了後面全盤皆使用華語來當主要語言，這邊可以印證了連帶影響的存在，但是這樣的影響效益會因為後一位聽話人的意識而有所增減。

(三) 閒話八卦 (gossip)

八卦閒話是在民眾之間少不了的一種消磨娛樂，而八卦也是一種社會之間信息流動的一種方式，在過去研究之中漢語與日語雙語者的語碼轉換之中，語碼轉換的動機有一功能為「在對話之中營造滑稽或幽默的氣氛」（大槻和也 2017）。因此筆者認為「閒話八卦」應與前述功能相似，是為了營造特定的對話氣氛而產生的功能。這邊我們可以以對話 4）來進行解釋，對話之中有說到了麗初來到臺灣時交友，麗在這段對話之中說麗的朋友講他的另一位朋友「恁答滴」等等的八卦時，用客語表達的現象，就是一種語碼轉換的現象。值得一提的是，這段閒話八卦的對話也是一種「引述」，指的是引用他人的話語，麗的朋友講他的另一位朋友「恁答滴」，然而轉述此情形的麗扮演聽話者的角色與引述八卦閒話，而這種透過談論八卦的語用過程，亦是影響語言使用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形成閒話八卦的因素除了引述外，刻意使用「客語」以及「音量放低」是必要條件，盡量避免那些令人尷尬的，詞彙而採用語碼轉換，以達到避諱的效果。（蔣滿英 2019：58）。

我們透過上面的舉例，大致可以知悉婚姻移民在臺灣生活的環境下，語碼轉換的功能主要聚焦在三大功能，分別是（一）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二）連帶影響、（三）閒話八卦。這樣的功能主要建立在說話人、受話人、語言環境等等的因素之上，尤其是語言環境的因素，在人們溝通之間，大多數會採取通行度高的語言。上述舉例之中僅閒話八卦功能將客語特別單獨進行有標語言的表達，且於閒話八卦時，說話語音會相對小聲。在此語境之下的說話人想要「建立新的權利與義務關

係，選中的語碼非當前對話中標記著無標的權利與義務關係的語碼」(Myers-Scotton 1993: 131)¹³，然，閒談八卦選中的有標語碼為客語，是刻意使用的一種方式，透過音量、語言的變化知悉此段對話為八卦閒聊。

綜觀今日臺灣，最高層的語言非華語莫屬，再者可能是閩南語，客語第三等等。而為何社會語言中的華語是處在最高級呢？這個問題和推行長達四十年以上的國語政策有關，臺灣普遍的教育皆是使用官方語言（即是華語）進行教學，而現今學生能夠使用閩南、客家，甚至是原住民語時，僅能透過一禮拜一小時的母語課程，再者就是透過在家庭進行學習，因此在臺灣，華語在社會之中的語言地位是最高級，最廣為受到民眾所接受。而除華語外的其他語言，則是需要透過說話人、聽話者、語言環境等因素來塑造其語言等級，舉例而言，本文中的六位發音人之中，麗亦有潮州閩南的身分，但因本次談話中周遭多為客家人，因此在麗的語言調適上，客語的語言層級會高於閩南語。

七、結論

本文檢視臺灣桃園地區的婚姻移民在客語以及之間的語碼轉換現象，雖說是個案分析，並不能以此研究結果來概括所有婚姻移民，但是就實地採錄的語料可以發現，語碼轉換是一種功能取向的語言行為，在多語環境之中，如此行為是相當普遍的，說話人可以根據自身所處的環

13 原文為：Make a marked code choice which is not the unmarked index of the unmarked RO set in an interaction when you wish to establish a new RO set as unmarked for the current exchange. (Myers-Scotton 1993: 131)

境與所互動的對象來調整自身要表達的語碼。研究發現，移民與家人（丈夫、小孩、公婆）溝通時使用客語及華語，與同鄉友人交談使用客語及印尼語，與非同鄉友人交談則使用印尼語，手機傳訊息則使用印尼文。婚姻移民與會說客語的訪談者對話時，經常出現華、客語語碼轉換的情形，尤其是人稱代詞：佢、你、佢。但如果是專有名詞、人名或地名，有時候會出現印尼語，語碼轉換的頻率提高。

由本文的個案觀之，婚姻移民語碼轉換的現象基本上支持 Myers-Scotton (1993) 的標記理論，同時顯示其社會動機，並經過協商原則決定語碼轉換。從本文的三段對話結構分析，發現依照主題以及對話者而有不同的語碼轉換情形出現，在第一段「來臺故事以及與配偶相遇過程」中，依婚姻移民自身背景而有不同表現，雪僅有華語及海陸客語的轉換，然而父母一方為潮州人的麗則是在閩南語、華語、四縣客語之間轉換。第二段涉及印尼當地宗教與政治，移民則會使用印尼語表達專有名詞。第三段談到初到臺灣的適應問題與印尼美食時，語碼轉換較少，但談到印尼美食時，亦出現印尼語。

語碼轉換的社會動機則與對話者的世代以及是否能理解有關，此外，也映射出婚姻移民因為上嫁概念而在夫家遭受公婆的限制或是將刻板印象加諸於其身上的狀況，抑或是在臺灣生活情形，以及身為客家華人的婚姻移民在印尼原鄉的語言使用。這些不同的對話，雖然主題各異，然而發揮如曹逢甫等 (2012) 提出的語用功能：（一）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二）連帶影響、（三）閒話八卦。其中呼應 Myers-Scotton (1993) 的研究所提出的三個信條，我們發現在有標選擇信條的出現時機，與閒話八卦的功能有高度相關，原因在於怕周遭人聽

懂，進而進行語碼轉換至其他低階語言。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連帶影響兩個語用功能則出現於無標選擇信條，是自然語流下所產生的轉換。

從本次的訪談音檔的資料之中，雖然本文為個案研究，但我們也因此知悉了婚姻移民在客家地區生活的語言使用。婚姻移民雖然以少數存在於臺灣人口內部，但是近年來透過婚姻關係來到臺灣的移民日漸增多，他們的語言使用仍是影響語言環境的因素之一。本文認為，客家地區內部的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和客家地區的居民差異不大，透過居住的時間拉長，「他鄉變故鄉」正是他們對於一地產生認同感的形容，透過本文也發現婚姻移民的語言使用也逐漸在地化，貼近本地居民，多使用華語、客語，此為社會語用功能中的不熟悉（或稱便於理解）、連帶影響，印尼語則是多出現於專有名詞的使用。

此外，我們也可以多注意婚姻移民客語以及華語語碼轉換之間的趨勢，即是客語與華語的融合，一般俗稱的「客家國語」。這種客家詞彙開始被賦予華語風味而出現在以華語為主題的談話方式，亦在本文中發現。這樣的語言模式常常出現在動詞的表達上，如：「*厝*」著¹⁴。我們還發現代稱作用在婚姻移民的語碼轉換之中最常發生，而代稱內容多以連接詞以及客語與華語對譯詞彙結果詞素不相同的那些詞彙，如：華語「老師」之於客語「先生」，但我們認為這樣子的代稱作用僅僅是處於婚姻移民與客家、華語之間的語言過渡階段。本文認為以目前的語言環境觀察，代稱作用的出現會愈來愈頻繁，如此在客語中參雜華語的語言模式會漸漸變多，除非刻意將其轉變成客語進入說話人語言系統，否

14 本文於訪問逐字稿整理中有此詞彙，但未在行文中舉例。

則可想而知，客語的語言表達能力會變得更弱勢，而華語的表達能力會變得更強。雖然語言在跨國通婚中極具重要性，但是若細部探究移民的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將會發現華語的優勢與客語的危機。對移民而言，華語是最主要的語言使用工具，客語僅分布在低階使用場合，尤其家庭場域是客語最主要的使用場所。因此可以斷言華語之工具性動機高於客語；客語之融合性動機高於工具性動機。就語言態度來說，華語、客語並非互補關係，而是客語逐漸向華語方向進行語言轉移之情況，這亦反映出臺灣當今客家之語言困境。最後，本文雖然所採集的樣本數量有限，然希冀透過語碼轉換之研究，一方面由此理解婚姻移民與臺灣社會的關係，另一方面，亦凸顯今日客語在今日臺灣社會的現況。

參考文獻

- 大槻和也，2017，〈「漢語—日語」雙語者語碼轉換現象之初探〉。《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5：1-38。
- 何自然、於國棟，2001〈語碼轉換研究述評〉。《現代外語》1：86-89。
- 吳孟擘，2014，《苗栗縣公館鄉東南亞新住民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調查》。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肖秀紅，2010，〈大學校園英漢語碼轉換現象分析〉。《邊疆經濟與文化》9：96-97。
- 夏曉鶯，1995，〈外籍新娘在美濃〉。《中國時報》，第15版，10月17日。

- _____，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 45-92。
- _____，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究叢刊。
- _____，2018，〈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二）〉。《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5/article/6576>，取用日期：2023年9月4日。
- 祝畹瑾，1992，《社會語言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張書銘，2002，《臺越跨國婚姻市場分析：「越南新娘」仲介業之運作》。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淑貞，2001，《國語言談中英語與閩南語的夾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張雅婷，2005，《臺印跨國婚姻仲介研究：以南港村為例》。國際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鈺平，2003，《臺越跨國婚姻之仲介業角色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翰璧，2007，《東南亞女性移民與臺灣客家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曹逢甫、葉瑞娟，2012，〈臺灣新竹地區客家話中語碼轉換的現象〉。頁47-73，收錄於鄭錦全編，《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黃玉玲，2014，《桃竹苗地區客籍家庭外籍配偶客語聽說環境與口語表達能力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

黃惠珍，2008，《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聰穎，2010，《「商業捐客還是傳統媒人？」「阿發叔」與其「客戶」的日常生活觀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芬芳，2017，〈「差不多…又不一樣！」：臺灣與印尼客家通婚之文化經驗〉，頁 287-316。收錄於蕭新煌編《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出版社。

蔡雅玉，2000，《臺越跨國婚姻現象之初探》。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滿英，2019，〈大學校園內語碼轉換的語用功能研究〉。《阜陽師範學院學報》4：56-60。

鍾鎮城、黃湘玲，2010，〈客籍新移民女性之語言使用與自我移民認同形塑〉，頁 693-716。收錄於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羅肇錦，2000，〈臺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P267-283。收錄於徐正光編《宗教、語言與音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rkoff, Abe, 1972,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 McGraw-Hill.

Auer, Peter, 1990, "A Discussion Paper on Code-switch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oncepts, Methodology and Data. Strasbourg: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 Chen, Shu-chuan, 2022, "The Language Shift of Taiwanese Hokkien and Hakka in Hsinchu County and Hsinchu City, Taiwan: A Data Comparison of the Surveys of 1978 and 20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5(2): 275-307. <https://doi.org/10.1163/24688800-05020003>
- Gibbons, John, 1987, *Code-Mixing and Code Choice: A Hong Kong Case Stud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Hwang, Sean-Shong, 1997, "Structural and Assimilationist Explanations of Asian American Inter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 758-772.
- Kalmijn, Matthijs and Frank van Tubergen, 2010,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ntermarriage: Explaining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al-origin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47(2): 459-479.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_____, 2002, "The anatomy of style-shifting." Pp.85-105 in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edited by John R. Rickford and Penelope Ecke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David C. S., Su-chiao Chen, and Feng-fu Tsao, 2010, "Self-reported code-switching motivations of educated Chinese speaker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 experimental study." Pp. 107-112 in *Ambiguity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aria Jodłowiec and

- Justyna Leśniewska. Krako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
- Lu, Melody Chia-Wen and Wen-Shan Yang, eds., 2010,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Social Issu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Muysken, Pieter, 1995, "Code-switching and grammatical theory." Pp. 177-198 in *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de-switching*, edited by Lesley Milroy and Pieter Muyske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UP.
- Myers-Scotton, Carol, 1993,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Evidence from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harma, Devyani, 2018, "Style dominance: Attention, audience, and the 'real me'." *Language in Society* 47(1). 1–31.
- Shih, Yu-hwei, and Mei-hui Sung, 1998, "Code-mixing of Taiwanese in Mandarin newspaper headlines: a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 Pp. 505-525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Languages in Taiwan*, edited by Shuanfan Huang. Taipei: Crane.
- Shu-chuan Chen, 2022, "The language shift of Taiwanese Hokkien and Hakka in Hsinchu County and Hsinchu City, Taiwan: A data comparison of the surveys of 1978 and 20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5: 275-307.
- van den Berg, Marinus, 1988, "Long term accommodation of (ethno) linguistic groups toward a societal language norm."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8: 251-269.

Wang, Hong-Zen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2009,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A Case Study on Code-switching of Indonesian Marriage Migrants in Taoyuan Yangmei District

Fen-fang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o-an Chia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fang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ince the 1990s, cross-cultural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ese men and women from Southeast Asia have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Notably, in Taiwan's Hakka regions, many marriage migrants are Hakka individuals from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In addition to their sharing a Chinese ethnic background, linguistic similariti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fostering closer connections between Taiwanese and Indonesian spouses. For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 the primary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is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現代標準漢語; Guoyu [國語] or Huayu [華語]). The use of other regional languages, such as Minnan or Hakka, varies by location. Most research in this area has focused on Taiwanese Minnan and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The use of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Hokkien, Hakka) also varies with the region, and most studies on

^{**}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18, 2023

Accepted Date: June 17, 2024

this topic have focused on Taiwanese Hokkien and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The current study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marriage immigrants in Hakka families in the Yangmei District of Taoyuan, conducting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employ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code-switching behaviors of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By using markednes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s employed by these immigrants and analyzed the social motivations and socio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ir code-switching practi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de-switching among Indonesian Hakka marriage migrants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versational interlocutor and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with shifts occurring between Hakka,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n general, their speech reflects a fusion of Hakka and Chinese, with a stronger inclination toward Chinese. Furthermore, the gener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onversational partner and the migrants' circumstances in both their hometowns and Taiwan shape their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sociopragmatic functions of code-switching. Migrants use code-switching to avoid misexpression of unfamiliar matters or to make it easier for others to understand. Additionally, the linguistic choices of one speaker often influence those of the other. In informal contexts,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gossiping or addressing sensitive topics, code-switching frequently involves shifts to lower level languag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use among Indonesian Hakka marriage immigrants by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migrants and their hometowns, in-laws, fellow nationals, and Taiwanese society at

large. In doing so, it reveals their social positioning within Taiwan's multicultural landscape.

Keywords: Hakka, Southeast Asia, Marriage Migrants, Code-switching

